

「蔣介石與抗日戰爭（1931-1945）」學術研討會紀要

任育德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會議籌備緣起

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成立於民國96（2007）年，是海內外首個以蔣介石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機構，成立後以推動蔣介石學術研究國際化為工作重點，中心研究人員以發表學術論文、學術演講、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客座教授來訪講學等方式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02年亦出版首批「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究叢書4本，展現中心人員學術研究成果。該中心自96年起已舉辦3次國際學術性會議、4次工作坊、合辦國際學術會議2次。99年舉辦中國大陸首個以蔣介石為主題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來，即陸續舉辦該主題之相關研討會。本年即在此主題下，以1931至1945年之抗日戰爭為重點，在緊鄰杭州西湖風景區之華北飯店召開會議，共60人與會。

民國103年6月7至9日，由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和《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聯合主辦的「蔣介石與抗日戰爭（1931-1945）」學術研討會在浙江杭州、奉化成功召開。來自美國、加拿大、韓國、紐西蘭及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地的專家學者群集於會議舉辦地華北飯店。開幕式上，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簡述會議緣起，即展開開幕式，分由香港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胡春惠、溪口旅遊集團辦公室主任滕菲、蔣經



與會者合影留念（照片提供／任育德）

國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浙江大學校友會榮譽會長李摩西致詞祝賀。

會議討論大要

大會報告分成兩場次，共 4 人報告。首先登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報告〈抗戰中的中國戰略與蔣介石〉，界分十四年中日戰爭期間為三階段：1931 至 37 年為中國守住底線時期，利在爭取準備戰鬥時間，弊在宣傳偏向妥協，傷害國家意志執行力。1937 至 41 年為苦撐待變時期，利在堅持即有機會，弊在貫徹抗戰建國政策措施不足。1941 至 45 年為大國戰略

時期，利在堅信能於反侵略戰爭中取勝及擴大國家利益，弊在國家利益未能成功極大化與抗戰建國未能克盡全功。由此他認為蔣介石作為有視野的領導者可說是對外有成，對內不足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報告〈臺灣的抗戰史研究近況〉，指出官方以臺北市文獻會、國防部為策展單位，維持抗戰記憶，民間則有逐步淡忘之趨勢。他同時簡介臺灣近年新問世之抗戰相關史料如軍事情報局收藏之前軍統局檔案以及由此衍生之初步研究成果；國史館即將出版陳誠及胡宗南日記，亦正集結歷史研究者推動「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撰寫計畫，均為臺灣值得注意之研究。他建議抗戰史研究

得跳出單純軍事與戰爭層次，納入戰爭與社會、戰爭與日常生活等新視角以擴充研究廣度。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以〈重看抗戰史：蔣介石與抗戰〉指出，透過該所典藏中國及美國現代名人檔案，如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史迪威、魏德邁等檔案，透過跨國、跨校之研究，將可重新詮釋中國抗戰在世界歷史上之關鍵意義及中國是如何開始邁向大國之路。韓國新羅大學裴京漢教授〈中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與韓國〉，論及開羅會議上的韓國獨立問題及琉球問題應放在「東亞視角」下觀察，中國嘗試承認韓國臨時政府以維持及擴大在韓國的影響力，顯示積極應對建立戰後國際新秩序之考量，但因無力挑戰將主導建立戰後東亞國際秩序之美國，使中國無法在短期內構築相稱於大國意識之局面。

6月7日下午起，22篇論文分成「蔣介石與戰時外交」、「外人眼中的蔣介石」、「蔣介石與抗戰軍事」、「知識界與抗戰」、「蔣介石與戰時政局」、「蔣介石戰時言論評析」等主題，在飯店四樓與六樓兩處會場進行一天半分組討論。

「蔣介石與戰時外交」主題有6篇論文。紐西蘭奧克蘭大學訪問學者潘邦正以澳洲人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與西安事變及澳紐軍團在太平洋作戰事蹟，提及二者均為中國從事抗日戰爭之重要盟友之一。四川農業大學副教授張祖龔〈盟友之爭：戰

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與美國接收日艦的衝突〉，以接收敵產——日本軍艦議題個案分析，指出中美雙方如何重新定位建構亞洲新秩序，及政府戰後對美外交體系逐漸失靈之現實。浙江大學副教授肖如平〈從日記看1942年蔣介石訪問印度：以蔣甘會晤為中心的分析〉，以蔣介石、甘地會晤為視角，考察蔣氏訪印，分析其參與國際事務之能力，認為蔣氏頗重視外交亦取得一定成就，惟缺乏現代外交意識，易將個人情感與國家混為一談，使個人與國家進退失據。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研究館員曹藝〈蔣介石對《蘇日中立條約》〉一文，敘述條約簽訂後蔣介石為維護中國抗戰大局計，是避免刺激蘇聯，並加緊對美外交以爭取外援工作為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侯中軍〈九一八事變後的中蘇復交：基於蔣介石日記的考察〉，從政黨之爭、派系之爭雙重面向分析1930年代中蘇復交問題，指出蔣氏依據國民政府內外環境變化而調整關注重點，認為剿共是內部問題，復交是對外問題，並未將二者置於一體考量。浙江大學歷史學系講師尤淑君〈蔣介石與1945年外蒙獨立問題〉，指出外蒙獨立問題在近代史上有久遠歷史因素與國際情勢影響，北洋政府以「拖延外交」維護主權，國民政府受迫戰局無法沿用該政策，只能以放棄蒙古宗主權換取新疆與東北之完全主權。

「外人眼中的蔣介石」主題有3篇論文。加拿大女王大學教授邱燕凌（Emily

Hill) 在〈抗戰期間西方人是如何看待蔣介石的?〉以 1940 年代加拿大政府與民間輿論有關蔣介石觀感變化作個案研究, 指出 1944 年前是英雄形象, 史迪威事件爆發後, 加拿大輿論受到美國新聞記者、外交官言論影響逐步轉變成執政無能者。青年美國外交官、新聞記者、政治學者著作對蔣氏負面觀感亦強化加拿大同儕之判斷自信, 兩種形象爭議則延續至冷戰時期撰寫之學術著作。浙江大學副教授趙曉紅在〈蔣介石對「二二六事件」的認知與反應〉指出蔣介石視該事件為危機與機運並存, 極力研究如何運用日本內部及日蘇矛盾使中國取得有利形勢。但因各國從國際形勢及國家利益考量, 日俄並未爆發戰爭, 蔣氏無法達成在蘇日間遊走之戰略目標。浙江大學講師陳群元在〈日本外務省對蔣介石的觀察與認識 (1935-1936) ——以外務省與蔣介石政府的溝通問題為中心〉, 指出蔣介石沿用與汪精衛合作之「中日親善」方針, 亦嘗試與日方商討簽署共同防共軍事協定, 但因蔣過於看重國內反對勢力與日方關係, 又發生日本駐成都總領事開館事件, 雙方國交陷入僵局, 中日關係無法突破。

「蔣介石與抗戰軍事」主題有論文 3 篇。浙江師範大學教授袁成毅〈蔣介石與戰時中國的防空〉認為蔣介石個人經歷及軍旅見聞, 使他從積極防空、消極防空二面構想空軍及防空網建立, 唯限於經費而處於「萬事起頭難」局面。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

長傅應川在〈蔣介石「持久抗戰」思想及其戰略意涵〉指出蔣氏抗日意念起於 1928 年濟南事件後, 現有日記最先提及「持久戰」為 1933 年間, 逐步擇定大西南作為後方基地。在 1938 至 39 年於湖南南嶽及陝西武功軍事會議, 擬定長期抗戰戰略規劃。蔣氏堅持的意志與指導, 使日軍雖有戰術卻無戰略, 種下敗因。浙江大學副教授方新德〈簡評浙贛戰役中蔣介石的戰略思考〉指出蔣作為最高統帥, 有其不同於他人的考慮高度 (國際關係層面), 使他為美國進行日本本土轟炸投注戰力, 臨陣改變部署, 最終影響浙贛戰場局勢形成不利局面。中國軍隊在戰役中頑強抵抗, 使日本無力進攻四川, 亦為浙贛戰爭之歷史意義。

6 月 8 日進行第二天分組討論。「知識界與抗戰」主題論文 3 篇。美國湖林大學教授陳時偉 “Intellectual Preparedness: Dr. Hu Shi, Lake Forest College, and Chinese Diplomacy during WWII”, 以該校發現胡適演講檔案資料為基礎, 考察 1941 年胡適選擇美國孤立主義精英匯聚大本營湖林區向大學生進行演講之事件始末, 是期望改變美國支持孤立主義之輿論氛圍, 以期為鼓動民間輿論支持中國抗戰工作而努力。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副研究員任育德〈抗戰時期蔣中正與胡適、王世杰互動初探 (1937-1942)〉探討胡適從政仍堅守諍友地位時, 王世杰在胡適與蔣介石之間如何起溝通協調及澄清誤解作用, 以及蔣如何掌握戰時外交高層人

事任免並主導外交決策，又透露用人思考方向。浙江大學講師張凱〈王道政治與蔣介石的抗戰建國方略〉，探討蔣介石抗戰動員的思想支柱為運用儒家倫理以凝聚及約束民族精神及道德修養，但難以調和文明復興與抗戰建國之間緊張關係，使得以王道思想轉化儒學作為建構文明國家的基礎難以為繼。

「蔣介石與戰時政局」主題有3篇論文。湖南科技大學副教授劉大禹〈蔣介石與戰時國民政府行政機構改革〉反思蔣介石推動戰時行政改革，但官僚體系執行力未能配合；追求制度化之際又運用手令致打亂官僚系統正常程序，戰時環境亦難容根本改造，導致蔣氏個人威望由此無法提升，也未能為戰後接收與行憲奠定基礎。合肥工業大學講師陳偉〈量與質之間：蔣介石與三青团員的徵收（1938-1945）〉，指出團員質量良莠不齊和體制、徵收策略失當有關，加劇三民主義青年團內部矛盾，也是蔣介石意欲藉三青团以「組織對抗組織」解決青年問題宣告失敗的原因之一。浙江理工大學副教授賀俊杰〈社會運動理論視野下的新生活運動簡述（1934-1945）〉，以社會運動理論分析考察抗戰時期新生活運動之社會動員體系、動員策略，指出垂直型由上到下動員，導致效果有限。新生活運動與抗戰及國家統治秩序整合之高度相關與正面意義的確不能忽視。

「蔣介石戰時言論評析」主題論文4篇。東南大學教授劉雲紅〈紀念的政治：蔣介石在「抗戰建國紀念日」的講話分析〉

探討抗戰建國紀念日此一紀念儀式如何喚起、強化與傳遞抗戰記憶的作用與侷限。雲南大學講師婁貴品〈中共對蔣介石「國族」觀的批判及其影響〉，指出中共建政之後批評蔣介石「國族觀」甚力，也影響了中國民族史、社會史等著作的寫作立論基礎，該批判如何形成、發展及影響即為作者關注核心問題。齊齊哈爾大學教授于耀洲〈由「積極抗日」向「抗日」與反共並重的轉變：再評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指出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是國民黨由「積極抗日」路線轉向「反共」「抗日」並重之重要標誌，肯定其堅持抗戰與聯共抗戰的積極意義。湖南師範大學副教授郭輝〈1936年蔣介石五十壽辰述論〉，指出獻機命名及操演活動是蔣介石建構和表演個人權威的表現，壽辰文字將孫文與蔣氏緊密聯繫，塑造蔣為孫之接班人及黨國唯一領袖，蔣介石崇拜也可說是抗戰民族主義之學生兄弟。

6月8日中午用餐後，會議延續慣例，移師溪口進行綜合討論，由《抗日戰爭研究》主編高士華研究員主持，胡春惠教授、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處長吳祖勝先生、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王文隆主任及陳紅民教授擔任引言人，高士華研究員最後作總結發言。講者向參與之學者、主辦單位及贊助者深致謝意。陳紅民教授表示，預計於會後一年出版論文集，下一屆會議將於該中心成立第十年（2017年）時召開。

6月9日，溪口旅遊集團及溪口博物館

安排與會學者在溪口進行學術考察，參訪蔣氏故居妙高臺、豐鎬房、玉泰鹽鋪、文昌閣、小洋房及雪竇寺、溪口博物館，親身考察與理解蔣介石故鄉在其一生中具備之情感及意義，大溪、角板山一帶確似蔣氏家鄉風光。在中共建政初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間，蔣氏相關故居曾受破壞，目前真正屬蔣介石父子所處時代保存完好之建物僅 1930 年代之小洋房（蔣經國夫婦自俄返國於奉化讀書居住地），其餘建物近年多逐漸在原基址原式重建及布置，以吸引觀光客造訪。中午用餐後返杭州賦別。

會議觀察所見

為期兩天的學術研討會中，較為遺憾地是沒有日本成長出身學者與會，參與中日雙方針對此一議題之研究對話。與會學者針對如何將歷史人物置於歷史進程中展開歷時性研究，以及如何在以特定歷史人物為中心時，也能夠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注重其他相關聯的人物、集團、具體的時空環境等因素也多所思考，力圖為人物研究在新史料出現之刺激及引發研究風潮外，能夠建立更深厚、更廣泛的研究基礎，以達到「見樹又見林」的目的。評論人也從個人不同知識背



妙高臺遠眺景致頗似角板山（攝影／任育德）

景及經歷指出，研究者要思考如何將大的歷史背景、借鑑各學科研究觀點和多國檔案史料及論著運用相結合，以呈現敘事清晰明確而又具有可讀性的歷史。如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王文隆指出將國際法放入外交史研究架構、透過國際法理解外交官思維之必要性。浙江大學梁敬明教授指出抗戰研究必須注意大的背景，蔣介石具有個人的、政黨的、國家等幾重面向，會因為身分轉換而影響決策。

本次會議既環繞在蔣介石主題，論文發表者復以中國大陸學者為主，由其論文使用檔案史料觀察，引用中國大陸與臺灣既有史料彙編出版品之外，檔案中以暫存美國史丹福大學之《蔣介石日記》，以及大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及臺灣史政機構（國史館、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典藏蔣氏相關史料，或與蔣氏相關黨政機構檔案即為渠等史料基礎。此中也充分反映中國大陸中央級重點研究機構、重點大學和各地大學掌握研究資源及訊息之鮮明差異。重點研究機構及重點大學因較能爭取資源出國進行學術交流、蒐集各地檔案及史料，在檔案史料掌握及運用較具優勢。該類型機構並透過學術交流及參與集體研究團隊等學術活動，得以接受最新學術研究成果與學術觀點，也較能擺脫前人政治意識先行（無產階級之敵人、落後封建主義者）之說，並開始透過史料重新理解蔣介石作為民族主義者與從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而事業未竟者等形象，或是探

討蔣氏建構現代化國家之思想侷限。如大陸學者汪朝光表示大陸和臺灣學者在「學術評判標準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家的學術眼光和學術追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註1）有海外留學背景者（如留學日本者）亦相對注重他國最新研究成果之傳遞，也樂於為中國大陸學界擔起學術溝通橋樑之責。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創辦《抗日戰爭研究》雜誌社即於今年，以特約稿及專題論文刊登由日本教書之中日兩國學者針對抗戰外交、戰爭動員議題之研究成果，讓中國學界知道日本史學界鮮少有所謂「政治右派」之實情，發揮激濁揚清之效用。

至於青年研究者在完成博士學位、獲得省重點大學教職後，除非在博士後時期參與研究團隊獲得一定學術交流脈絡，否則得靠自身力量蒐羅資料，復受限中國檔案史料閱覽不易，獲得獎助至海外進行學術交流及蒐集資料機會有限所致，導致史料運用較為有限與高度重疊等問題。中國大陸期盼爭取商界資源設立民間獎助機制培養青壯輩有志學者赴海外蒐集史料、進行學術交流之聲已在本次會議出現，實值得關注其後續發展。

就選題意識言，會議主軸仍以政治、外交、軍事等課題為主，間雜人物形象建構、知識分子關係等課題，呈現在中國大陸現代史研究界在人數與培養青壯輩接手情勢下，仍有一定研究者從事主流歷史課題，以及該地因《蔣中正總統文物》及《蔣介石日記》開放之故，使蔣介石學術研究成為中國近代

史顯學之一；相較之下，臺灣近年從事此類課題漸趨減少，青壯輩從事相關課題研究意願不若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為高情況顯然不同。在新觀點運用上，中國大陸學界近年亦已運用社會動員、民族學理論、集體記憶塑造等新社會史、新文化史研究取徑探討既有議題，但或屬粗胚雛形，易有「先有假設，再代入史料」之弊端，能和史料密切結合，具體應用於蔣介石學術研究富有質量之成果尚有待深化。

結語

臺灣及海外出身學者在研究取徑、語文閱讀能力、掌握多方史料及解讀史料，不受蔣介石視為「民族救星」宣傳窠臼及外間「去蔣化」羈絆，能將之視為常人，進行多種日記、檔案之比對解讀。在史料運用並不拘泥於單一史料，且紮實地解讀史料，並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完成個人研究實不容忽視。但臺灣學者是否能更多地運用地利之便，以及廣受海內外學者稱道之檔案資源取得之友善性，力保研究成果經得起學術檢證？此外，如何在既有資源及學術訓練基礎上持續創新，在中國現代史研究並非學術發展重點的外在環境中堅持研究，是臺灣學者處在激烈學術競爭環境下必須自我省思之處。能否爭取有興趣於學術之商業人士與青年學者獎助研究，拓寬其研究視野並進行史料蒐集，也是值得產官學各方在中長期學術發展

上深思之事。

透過跨國、跨團體以集體研究方式爭取學術研究資源，進行學術研究到完成成果也是在這次會議中呈現趨勢，如史丹福大學「重寫抗戰史」小組亦由郭岱君代表與會；團體方面亦以浙江大學系統為主力，在中國大陸學界確實散發一定研究能量及實力。誠如陳紅民在綜合座談所言，此一研究領域發展至今，應思考從「做什麼」到「如何做」問題，（註2）如何豐富並深化抗戰史及蔣介石學術研究，也是參與會議者及各相關單位在執行及推展蔣介石學術研究時必須多所思索之議題之一。

【註釋】

1. 〈今天我們如何談論蔣介石——《蔣介石傳》出版座談會實錄〉，2013年9月11日，經濟觀察網，<http://eeo.com.cn/2013/0911/249683.shtml>（2014/6/23點閱）。
2. 陳紅民於今年初組織「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筆談，邀集臺灣、韓國、中國、日本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或指出蔣介石研究在史料、方法論與國際合作方面的方向，或專題研究之示範。陳氏指出，好的問題意識，是引導學術研究前進的基礎，可避免陷入枝微末節，事半功倍的困境。陳氏也提及，蒐集文集、報刊、回憶錄、文史資料、外交檔案等基礎工作，既可豐富民間輿論及外國人對蔣認知變化之研究，也可透過專題整理史料，引發新課題、新方法、新觀點，在時間與空間上拓展「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研究課題。陳紅民，〈蔣介石研究：做什麼？怎麼做？〉，《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1期（2014年1月），頁177-180。